

# 我的生平

(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75

*Leon Trotsky*

MY LIFE

*An Attempt at an Autobiograph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0, New York

根据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社1930年版译出。

内部发行

我的生平

列·托洛茨基著

华东师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译  
政教系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76千字

1980年12月 第1版 1980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书号: 11135.001 定价: 0.95 元

## 說 明

《我的生平》是列·托洛茨基 1929 年被逐出苏联后在土耳其普林吉坡岛撰写的自传。作者叙述了自己青少年时期，参加革命，被捕，流放，流亡以及十月革命后参加苏维埃国家领导工作期间的经历。作者在书中有不少自我标榜之处，有些观点显然也是错误的，但它从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角度提供较多的资料，对研究二十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状况及托洛茨基的思想演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根据英译本转译。参加本册译校工作的有，翻译：杜聿玉（前言，第1—2，4—6章），张敏樑（第11—17章），李宏祥（第7—10，18—23章），陈石（第24—28章），山顺明（第3章）。校对：文心，杜聿玉。加工订正：周尚文。

## 前 言

回忆录在我们的时代又繁荣起来了。这种繁荣可能是空前的，因为值得讲述的事情很多。时代愈是富于戏剧性的变化，人们对当代历史的兴趣就愈浓厚。风景画的艺术绝不产生于撒哈拉沙漠。目前正处于两个时代的“交叉”时期，不由人兴起通过当年积极参与者的眼光对早已消逝的昨天来一番回顾的愿望。这就是自从世界大战以后大量涌现怀旧作品的原因。本书的出版或许也是这个道理。

本书之所以能够问世，实在由于作者的积极政治生涯的停顿。君士坦丁堡竟然成为我生平中意想不到的，然而绝非偶然的一个驿站。我在这儿解鞍少驻（但不是第一次），静候着事态的发展。革命者的生涯中没有一点儿“宿命论”是完全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在环境允许我继续迈进之前，君士坦丁堡的暂歇应是我回顾往事的最恰当的机会。

最初，我为报纸撰写粗略的自传体素描，原想聊以塞责而已。现在，我想说的是，自从避难以来，我便无力兼顾这些素描到底以什么方式公诸于世了。然而，每一部作品都有它本身的逻辑性，直到大致完成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才开始认真起来。于是，我决定写一本书，采用不同的、范围更为广泛的素材，重新撰写。这本书跟原来登在报纸上的文章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是，两者探讨的是同一个主题；在其他方面，它们却是截然不同的产物。

我特别着力于对苏维埃革命第二时期的细节的描述。这个时期的开始正好是列宁生病和发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战役的时候。正如我将要证实的那样，不肖之徒的权势斗争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斗争，它代表一个反对十月革命的新政治派别，也是热月政变<sup>①</sup>的准备。这就自然而然地对人们经常问我“你为什么丧失权力”的问题作了答复。

一个革命政治家的自传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系列有关俄国社会发展，多少也有关全人类，特别是有关那些被称为革命的关键时期的理论问题。当然，在这些篇幅中，我无法审查错综复杂的理论问题，评论它们的实质。在我个人生命中充当那么重要角色的，更重要的是在东方许多国家中具有那样深刻的现实意义的所谓不断革命论，在这里只是作为次要的题目，略加叙述。假如读者对这样的处理还不满足，我认为探讨这些涉及革命实质的理论问题应分别写成专著。在那里，我将对最近几十年的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总结。

许多人物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出场，他们将会发现我不尽是按照他们自己或党派的原定的光圈去摄取；许多人也许会指出我的叙述缺乏必要的公允，甚至在报纸上选登的摘录已经引起某些否定，这是无法避免的。我相信，即使我成功地把自传变成自己一生的银板照相（我从来不想这样做），书中所描述的由于当时冲突而开展的论争，仍然会在本书里引起回响。这本书不是我一生的不偏不倚的写照，可是，它是我生平的组成部分。在这些篇幅中，我继续进行着毕生所致力

---

<sup>①</sup> 热月，法国共和历的第十一月（公历7月19日至8月17日），1794年热月9日（公历7月27日），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热月党人”发动政变，取代了雅各宾专政，组成督政府。历史上称为“热月政变”。——译者注。

的斗争。我的描绘既有特写，又有评价；我的陈述既保卫自己，也时常展开反击。我认为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把自传写成具有较高意义上的客观性，就是说，使它能够最恰当地表达人物、环境和时代。

客观并不是假装漠不关心，否则便是伪善。说到朋友与敌人，发现未便直说的地方便转弯抹角地暗示读者，这种客观不是别的，而是传统的骗局。我无需这样做。没有人曾经成功地做到写自传而不涉及本人，我既然要写自己，就没有理由隐瞒我的同情与反感，我的爱与憎。

这是一本论战性的书，它反映了那种全部建筑在矛盾上的社会生活的动力。小学生对老师的无礼；客厅里，在温文尔雅的面纱下隐藏着话里带刺的妒忌；经常的商业竞争；理论和应用科学的各分科间、艺术的各分科间以及运动会上疯狂的竞赛；议会里的倾轧揭示了深刻的利害对立；报纸上每天连续不断的猛烈斗争；工人的罢工；示威运动参加者被打倒；文明的邻邦互相在空中投掷炸药包；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几乎从未熄灭过的内战火焰，这就是形形色色的社会“论战”。其形式从一般的、常见的、正常的、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即使是强烈的斗争，直到非常的、爆炸性的和喷发性的战争与革命等等，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全都和它一道成长，同呼吸，共生息。假如需要按照今天的方式忠于我们的时代，我们怎能不参加论战呢？

但是，这里还有另一个而且是基本的准则，就是关系到陈述事实是否真心诚意的问题。就象最尖锐的革命斗争必须考虑到时间和地点一样，争论最激烈的著作必须注意其中的

人和物是否摆在恰当的部分。我希望我对这个要求，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细节上都已经给予应有的注意。

在某些即使不是很多的情况下，我以对话的形式陈述过去的谈话。没有人要求一字不差地复诵多年以前的谈话，我也不敢说有这么精确。其中有些对话倒不如说是象征性的。但是，每一个人在一生中总有某些时刻对个别的谈话印象非常深刻，毕生难忘。人们经常三番五次地把这些话对自己的私交或政治友人倾吐，多亏这种方式，它们便牢固地记在人们的脑子里。当然，我就是这样一直记住主要的政治性谈话。

这里，我要声明我一贯相信自己的记忆。它曾经不止一次地从事实中得到证明，圆满地经受过考验。但是，必须有个保留。即使我的地形记忆力（更不必谈我的音乐记忆力）是非常薄弱的，而我的视记忆和语言记忆也只是中等的，但我的思维记忆力却远远超过一般水平。还有，在这本书中，各种思想、它的进化以及人们为这些思想而进行的斗争，则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的确，记忆并不是自动的计算机。首先，它从来都是受个人的好恶所左右的。记忆往往把不利于生活本能（通常就是控制记忆的野心）的事件排除掉，或把它赶到黑暗的角落里去。但是，这是一种牵涉到“精神分析”批判的事。不过这种批判有时虽大有见地，富有教育意义，但大都是反复无常或武断的。

不用说，我曾经坚持不懈地把我的记忆与文件作过核对。虽然我的写作条件十分困难，但在向图书馆咨询或检索档案的过程中我已经对所有重大的事件和必要的日期作了核实。

从1897年开始,我主要是拿着笔杆子参加斗争。所以,我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在总共三十二年的时间里,几乎不间断地在出版物上留下痕迹。从1903年开始的党内派系斗争中穿插着许多个人插曲。我的反对派跟我自己一样,并没有停止攻击。所有的人都在白纸黑字上留下刀疤剑痕。自从十月革命以来,在年青的苏维埃学者以及所有机构的研究作品中,革命运动的历史占据主要的地位。每一件使人感兴趣的事都在革命的档案和沙皇的警察局档案中检索出来,加上详细的事实评注,予以出版。最初几年,还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伪装,这项工作一直在认真地进行着。列宁以及我的一些《文集》都由国家出版社刊行,每一卷都附有几十页的注释,包括有关作者活动及同时期重大事件的无法估价的真实材料。当然,所有这些对我的著作提供了便利,帮助我排定正确的年表,避免事实的错误,至少避免最严重的错误。

我并不否认我的生活不是依照通常的路子走的。因为这是时代环境,而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的。当然,某些个人的特征也必然会表现在我的行事之中,好事也罢,坏事也罢。但是,在其他历史条件下,这些个人的特点也可能完全潜伏着,就象许多倾向和情感在社会环境不需要时只好潜伏着一样。从另一方面说,其他在今天给排挤和压抑的品质,那时却可能走在前头。客观凌驾于主观之上,到头来是客观决定一切。

大约从十七八岁开始,我的理智和积极的生活便是为求得明确的思想而展开经常的斗争。我个人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引起公众关切的大事。我一生中凡是算得上不寻常的插曲都跟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并从中获得意义。单凭这一点就



可以写自传了。然而，作者遇到的许多困难也是从同样的源泉中涌现出来。我个人生活中的种种事实已经证明是跟历史事件那样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此外，本书不完全是—部历史著作。这里，各种事件并不按照它们客观的意义，而是根据它跟我个人的事迹相联系的方式来处理。因而，十分自然，假如把这本书作为历史著作，那么，特殊事件以及整个时代的叙述就显得很不相称。我必须在自传与革命历史之间探索出一条分界线。用不着把我的生平故事写成历史性的论文，同时，却需要把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交给读者。要做到这一点，我假定重大事件的轮廓他已知道，而他的记忆只需要简略地提起历史事实以及它们的前因后果。

估计本书出版时我已届半百之年。我的生日正好同十月革命巧合。任凭神秘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的信徒<sup>①</sup>高兴从中得出什么结论都可以。我本人仅仅在十月革命后三年才发现这个古怪的巧合。我在一个僻远的小村子里度过九个年头。在中学读了八年书。中学毕业后—年，我第一次被捕。我跟同时代的其他人—样，以监狱、西伯利亚以及流放的异乡作为大学。我在沙皇的监狱里前后两次—共呆了四年。在沙皇时期，我第一次度过两年的流放生活，第二次是几个星期。我两度从西伯利亚逃走，流亡国外，在欧美各国共度过十二年——两年是在1905年革命以前，还有将近十年在革命失败以后。1915年，在战争中，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在我缺席的

---

① 毕达哥拉斯，希腊哲学家（公元前六世纪），相信灵魂轮迴学说。  
——译者注。

情况下判处我徒刑。第二年，我被迫从法国来到西班牙，在马德里狱中经历了短期监禁，并在警察的监视下在加的斯逗留了一个月，然后被驱逐到美国。在美国，直到革命爆发后，我便从纽约动身回国，于1917年3月途中被英国警察逮捕，在加拿大集中营里呆了一个月。我参加了1905年和1917年革命。1905年，我当上彼得堡苏维埃主席，1917年再次当选。我直接参与十月革命并成为苏维埃政府的一员。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我到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跟德国、奥匈、土耳其以及保加利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我致力于组织红军并恢复红色海军的工作达五年之久。1920年，我还参加管理国家的混乱不堪的铁路系统。

但是，除了几年的内战外，我生活的主要内容一直是党的活动和写作。1923年，国家出版局开始出版我的选集，连续出了十三卷，其中还未包括过去出版的军事方面的五卷著作。到了1927年，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迫害愈来愈猛烈，出版中断了。

1928年1月，我被当今的苏维埃政府流放，在靠近中国的边境呆了一年；1929年2月，我被驱逐到土耳其。现在，我正在君士坦丁堡写这几行文字。

即使是这样浓缩的提要，我的生平的梗概也不能说是单调的。相反，屈指数一数多少次的反复、惊动、冲突、浮沉，人们可能会说我的生平的确充满“奇遇”。但是，我必须说，根据天性，我和奇遇的探寻者毫无共同之处。我有点书呆子气，拘泥习俗。我喜欢并重视纪律和秩序。我还要再加一句，我不能容忍混乱和破坏。这绝不是说反话，事实就是如此。我向来是一丝不苟的兢兢业业的小学生。我一生都保留着这

两种品质。在内战期间，我乘着火车走过几乎是绕地球几倍的路程。我非常兴奋地看到沿途用刚劈好的松木板建成的新篱笆。列宁深知我的这种感情，经常用友爱的方式取笑我。一本能使人从中发现新思想的好书，一支能把自己的思想与他人沟通起来的妙笔，直到今天我还是把它们看作是最珍贵、最亲密的文化产物。我从未放弃要求读书的愿望。在我的一生中，好几次感到革命干扰了我的系统工作。然而，在我的自觉生活中，几乎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完全充满着革命斗争。假如我有机会从头生活起，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同样的道路。

作为第三度侨居异乡的流亡者，我不得不写下这几行。当年曾经那样坚决地参与创建苏维埃共和国的我的亲密朋友，现在全被塞进监狱或予以流放。其中有些人，在敌人面前动摇、退缩、屈膝。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因为他们的确已经精疲力竭；有的则因为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找不出其他的出路；还有的人受不了肉体报复的压力。我已经经历了两度这样大规模的放弃旗帜的情况，那是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以及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因此，从个人经验中，我已经深刻地领会到历史潮流的起落。它们受本身的法则所制约。纯粹的急躁决不会加速它们的变化。我已经习惯于不从个人命运的立场去观察历史的前景。了解事件的因果关系，找出人们自己在这个关系中的地位，这是一个革命者的主要职责。同时，这是给一个不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眼前的人以最大的个人满足。

列·托洛茨基

1929年于普林吉坡<sup>①</sup>

<sup>①</sup> 普林吉坡位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东南，马尔马拉海中的一个小岛。  
——译者注。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扬诺夫卡	1
第二章 我们的邻居和我的启蒙学校	29
第三章 敖德萨：我的家庭和我的学校	46
第四章 书本以及早年的冲突	67
第五章 乡村与城市	88
第六章 转变	104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115
第八章 头几次狱中经历	127
第九章 第一次流放	138
第十章 第一次逃跑	148
第十一章 第一次出国	157
第十二章 党代表大会和分裂	166
第十三章 回国	183
第十四章 1905年	194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亡	208
第十六章 第二次流亡国外：德国社会主义	225
第十七章 准备新的革命	246
第十八章 大战的开始	261
第十九章 巴黎与齐美尔瓦尔得	272
第二十章 我被驱逐出法国	282
第二十一章 经过西班牙	289
第二十二章 纽约	303
第二十三章 在集中营	314

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	322
第二十五章	关于诽谤者.....	336
第二十六章	从七月到十月.....	351
第二十七章	决定性的一夜.....	362
第二十八章	1917年的“托洛茨基主义”.....	371

## 第二十九章 掌 权

那些日子在国家生活和个人生活中是异乎寻常的。社会情绪的激昂和个人权力的膨胀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群众正在开创一个新时代，领袖们则意识到他们的步伐符合历史的进程。那些日子所作的决议和所发布的命令决定了整个历史时期的国家命运，然而那些决议几乎是在没有经过讨论的情况下作出的。我简直不敢说这些决定是经过适当斟酌和考虑的；实际上它们几乎都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但这对工作并没有造成损害。因为事情是那样紧迫，要做的工作是那样明确地摆在我们面前，以致一些极其重要的决议理所当然地产生出来，并且理所当然地被通过。道路业已确定，眼前最需要的是指明具体办法。无需争辩，也无需什么申诉，群众总是毫不迟疑地采纳形势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在事态迅速发展情况下，“领袖们”的任务只不过是列出解答人民需要和历史要求的方程式而已。

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看作是无意识历史过程的有意识表现。但是这种“无意识”的过程（从这个词的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说，而不是从心理学意义上说）只有达到高峰，也就是当群众在纯粹的自然压力下冲破社会常规，胜利地表达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同有意识的表现重合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这种时代的高度理论觉悟才会同那些对理论毫无所知的被压迫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这种有意识同无意识的创造性结合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灵感”。革命则是由灵感引发起来的历史大疯狂。

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知道，创作的时机就是在某种东西强烈地迫使自己非写不可的时候。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就是好象某个比自己高明得多的人通过自己的嘴巴说话的时候，这就是“灵感”。它来自一个人呕心沥血的创造性努力。无意识的东西从井底升起，使有意识的理智屈从于自己，并和它合并成为更大的综合体。

这种巨大无比的精神活力有时也会灌注到一切同群众运动有联系的个人活动中去。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领袖们确实有这样的体验。那种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机体潜在力量，根深蒂固的本能以及机体的察觉能力一下子都复苏过来，冲破心理常规，从而同更高级的历史哲学的抽象观念结合起来，为革命服务。影响个人和群众的这两个过程都是以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为基础的，也就是以人的本能（意志的主要动力）与高级的思想理论结合为其基础的。

从表面看，这并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人们忍着疲倦、饥饿和身上的污垢，带着熬红的眼睛，满脸的胡子来回奔走。而在事后，他们中间谁也记不清那极其紧张的昼夜是怎么度过的。

下面是从我的妻子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写的札记中摘录下来的一段话：

“在准备十月起义的最后几天里，我们住在塔夫利达街。L.D整天守在斯莫尔尼宫里。我仍在属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木业工会里工作，那里气氛很紧张。大伙整天都在谈论起义。工会主席拥护列宁—托洛茨基观点（当时就是这样连在一起说的），于是我们就一起进行宣传鼓动。在马路上、在餐桌旁、在斯莫尔尼宫台阶前的临时集会上，人们都在议论起义的问题。我们缺吃少睡，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

大部份时间，我们不能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在十月的日子里，我真为他们担心。廖瓦和谢廖沙以及一个被他们称之为‘同情者’的学生，在学校里是仅有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三人面对的却是一大批紧密联合的，站在当权的民主党，即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一边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受批判不算，往往还得挨揍。有好几次，校长不得不把我的儿子从那些‘民主党人’的围斗中解救出来。反正儿子总是以老子为榜样。校长是个立宪民主党人，所以经常惩罚我的孩子，责令他们‘拿着帽子回家’。革命后，看来再也不能让孩子在那个学校念书了，于是就转到一所‘平民学校’去，那里设备虽然简陋，但比较自由。

“L·D和我很少在家，孩子们放学回来，发现我们不在，就认为自己也不必呆在屋里。在经常发生示威、冲突和枪击的日子里，我们真为他们的安全担忧，因为当时他们也受到革命情绪的感染……。当全家短时间团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兴冲冲地把路上的见闻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电车上看到几个哥萨克士兵在阅读爸爸写的《告哥萨克同胞书》。’

‘后来呢？’

‘他们看完后又传给另外一些人看。写得真好！’

‘好吗？’

‘嗯，好极了。’

“L·D的一个朋友K工程师，家里有一大群孩子，所以雇了家庭教师、保姆等人，他建议我把两个孩子放在他家里，好有个照应。这当然再好也没有了，我马上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我每天总得去斯莫尔尼宫四、五次，替L·D办点事情。我们总是很晚才回家，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分手，他去斯莫尔尼，我去工会。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刻，我们几乎寸步不离斯莫尔尼，有



时，L·D甚至好几天不回家睡觉，我也经常在斯莫尔尼过夜。我们连衣服也不脱就睡在沙发上或者椅子上。正值秋天时分，天气开始转冷，连日来天气干燥而阴沉，秋风萧瑟，寒气袭人。几条主要的街道显得寂静、萧条。这种沉静的气氛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警戒心理，而斯莫尔尼宫却是热气腾腾。整个大厅灯火辉煌，日夜挤满人群。各工厂气氛紧张，街上却是冷冷清清。大街是那样寂静，仿佛全城都在担惊受怕，把头缩在领子里似的。

“记得在起义后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早上，我走进斯莫尔尼宫的一个房间，碰巧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L·D在里面，如果没记错的话，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捷尔任斯基、越飞和其他许多人。由于睡眠不足，他们脸色苍白，眼睛通红。他们的衣领很脏。房间里烟雾腾腾……有一个人坐在桌上，被许多等待命令的人围着，列宁和托洛茨基也在这些人群中间。我觉得命令好象是睡着的人发布的。他们谈话和走动的样子有点象梦游者。片刻之间，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在梦中看到这一切；我似乎觉得，要是他们再不好好睡上一觉，换上干净的领子，革命就有失败的危险；我的梦同那些衣领紧紧联系着。我记得第二天碰到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我就提醒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换件干净的领子。她笑着回答说：‘喔！对！对！当然得换！’不过，到了这时候，换领子已不再是把我压得透不过气的大事了。”

政权被接管了，至少在彼得格勒是这样。列宁还是没有时间换他的衣领。他面容憔悴，可是目光仍然炯炯有神。他温和地瞧着我，带着那种就他来说是表示亲热的忸怩神态。“你知道”，他吞吞吐吐地说着，“从受迫害、过地下生活到突然掌起权来，……”为了斟酌某一个词他停顿了一下最后突然用德